

森春濤與《新文詩》系列

陳 文 佳

春濤上京的背景與動機

一．江戶末期絕句選的盛行

考察森春濤一生的文學活動，大約可以分為三個時期。自天保六年（1835）春濤十七歲時至尾張國丹羽村從鷺津益齋研習漢學，至安政四年（1857）秋三十九歲時蓄髮棄醫¹為止，可視作其文學活動的第一期。在此二十餘年間，春濤繼承了家族行醫的本業，並積極於漢詩創作。這一時期是春濤創作上的青年期，也是他以漢詩人身份登上文壇前的準備期。此後，文久三年（1863）五月，四十五歲的春濤移居名古屋桑名町三丁目，起桑三吟社，正式棄醫從文。至明治七年（1874）十一月舉家遷往東京以前，可以視作春濤文學活動的第二期。此一時期春濤以漢詩創作為主業，經過十餘年的磨煉與累積，創作上已日趨成熟，其在漢詩壇的影響亦逐漸擴大。自五十六歲時遷居至東京下谷，起茉莉吟社，至明治二十二年（1889）七十一歲時病逝，是春濤文學活動的第三期。這一時期，春濤不僅持續進行漢詩創作，同時致力於刊刻《東京才人絕句》，創辦編選漢詩文雜誌《新文詩》、《新文詩別集》、《新新文詩》，抄錄出版《清三家絕句》等等。其文學活動的內容更為豐富多樣，達到鼎盛時期。

明治七年（1874），森春濤舉家自名古屋遷居至東京下谷，結茉莉吟社，翌明治八年刊刻《東京才人絕句》，並開始創辦漢詩文雜誌《新文詩》。關於春濤舉家東遷的動機，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考察。

幕末時期，已有漢學者陸續編選當世日本漢詩人的詩作結集出版，並形成不小的風氣。譬如文政十二年（1829）刊刻加藤淵編選的《文政十七家絕句》二卷二冊，收錄當時著名詩家如菅茶山、市河寬齋、賴杏坪、館柳灣、柏木如亭、大窪詩佛、菊地五山、田能村竹田、卷菱湖、賴山陽等人作品五百首；天保九年（1838）刊刻三上恒編選的《天保三十六家絕句》三卷三冊，收朝川善庵、大窪詩佛、菊地五山、梁川星巖、篠崎小竹等詩家作品九百二十五首；嘉永元年（1848）刊北尾墨香編選的「嘉永二十五家絕句」四卷四冊，收梁川星巖、貫名海屋、中島綜隱等二十位名家共九百六十六首作品；安政四年（1857）二月刊額田正編選的《安政三十二家絕句》三卷三冊，於上述名家外，又增列齋藤拙堂與藤森大雅的作品，共

收漢詩七百四十九首。文久二年（1862）刊櫻井成憲所編《文久二十六家絕句》，收錄草場珮川、廣瀨旭莊、大沼枕山、森春濤、藤井竹外等詩人詩作計六百一十八首。慶應二年（1866）刊內田修編「慶應十家絕句」二卷二冊，收大沼枕山、小野湖山、植村蘆洲、鷺津毅堂、鈴木松塘、關雪江等十家詩。大政奉還、改元明治以後，額田正選編《明治三十八家絕句》於明治四年（1871）刊行，收入幕末諸名家及菊地溪琴、小野湖山、大沼枕山等新進漢詩人的作品。其中森春濤詩收三十八首，超越小野湖山、大沼枕山等同輩詩家，位居第一。其後，明治十一年刊關三一編《明治十家絕句》二卷二冊，收入大槻磐籟、小野湖山、森春濤、成島柳北等諸家詩作。幕末明初這一時期漢詩集編選與刊刻的盛行，表現出當時的漢學者與詩人們對漢詩創作傾注以極大的熱情與努力。作品是否被收錄，以及收錄數量的多寡，關係著或者說決定了詩人在漢詩壇分量的輕重與地位的高低，而能夠選編這種詩集的人物，通常自身也兼具漢詩人的身份，並且在當時的漢學圈已具備了一定的地位，通過這樣的編修出版工作，更加鞏固甚或壯大了自己在漢詩領域的聲名。

二．舉家東遷的動機

對於久居於名古屋的森春濤來說，當然希望自己的漢詩活動不僅僅侷限在東海一隅，而是通過明治的新都東京這樣一個巨大的舞台，將自己在漢詩壇的影響力迅速提升，得以輻射至全國。遷居東京以前，明治四年春於京都出版的《明治三十八家絕句》一書中，所收春濤詩超越諸家而居冠。這說明了春濤在當時的漢詩壇，其實力與聲望已為世所公認。與同輩詩人如小野湖山、大沼枕山等人相比，春濤無疑已取得了更使人矚目的地位。這一排名應當給予了春濤相當大的信心，他最終能夠作出舉家東遷的決定，大約與此不無關係。

另一方面，自明治元年（1868）三月起，春濤開始在尾張藩校明倫堂教詩。明治五年（1872）二月，其妻國島氏急病逝世，得年四十歲。春濤與國島氏共同生活十餘年，並且育有一子，感情不可謂不深。尤其是這十年恰恰是春濤棄醫從文的前十年，國島氏給予了春濤很大的支持與鼓勵。正當春濤在漢詩界聲名漸著而有所小成的時候，國島氏的猝死，給春濤以相當大的打擊。國島氏逝世後，春濤將子泰二郎託付於其外祖美濃國島氏，自己則寓居於養老山下戶倉竹圃，明治六年三月十四日又移居至岐阜，僑居木葉庵，即香魚水裔廬。因東南面山，號九十九峰軒；北俯藍川，又號三十六灣書樓。這一時期春濤的詩集題曰《敗柳殘荷集》，可以想見其心境之沒落。當明治七年終於決意遷居東京時，春濤已五十六歲。對於春濤在國島氏喪後萍蹤浪跡的一段歲月及其決意遷居東京的舉動，橫田天風氏以為：“先生連年遭遇不幸，悲惋不止，名古屋永住之念亦漸灰冷，何其數奇太甚。”²所謂連年遭遇不幸，當

指春濤先後經歷三次喪妻、一次喪子，並在安政大獄中痛失師友等事。當然，業師梁川星巖與妻子國島清的逝世給予春濤很深的打擊，這從他的漢詩創作中可以看出。³不過，大政奉還遷都東京以後，幕末時期黑暗恐怖的政治空氣已然消褪。事實上，春濤對於明治天皇的新政，懷抱著很大的期望，對於新都東京也不勝嚮往。據橫田天風記載：“先生明治七年十月十六日五十六歲之時，攜兒泰二郎氏（後號槐南，為文學博士）、篔室伊藤氏，自岐阜發，二十七日至東京，卜居於下谷摩利支天街。”⁴伊藤氏即伊藤織禔，系國島氏故後春濤所娶第四任妻子，既稱篔室⁵，可知系春濤側室而非正妻。春濤遷居東京，自岐阜啟程，隨行家眷只有子槐南與妾室伊藤。對於春濤來說，放棄名古屋穩定的生活，舉家搬遷至陌生的東京，應當是下了很大的決心的。

春濤上京前後的文學活動及心理

一. 上京前的詩作

啟程上京前，春濤與子侄輩一同登岐阜金華山，並詠有七律《登覽》一首：

登覽先凭百尺樓，山河形勝眼前浮。

霜華雁警北京信，月氣魚潛南島秋。

都督撫將多遠略，大臣排難有深謀。

壯心雖老吾何已，決眚蜻蜓影外洲。⁶

此詩頷聯與頸聯四句，當意有所指。明治七年（1874）五月，日本以琉球王國船難倖存者遭台灣原住民“出草”⁷殺害為由，出兵攻打台灣南部原住民部落，這是明治政府首次向海外派兵，也是近代史上日本與清政府之間第一次重要外交事件。春濤所謂“北京信”、“南島秋”云云，大約即隱喻此次事件而言。頸聯中所云“都督”，當指西鄉從道。西鄉於本年被任命為台灣蕃地事務局都督，於長崎港領兵待命。雖然明治政府迫於內外壓力下令中止出兵，但西鄉拒不受命，斷然率三千士兵前往台灣。“大臣”當指大久保利通。日本出兵台灣，遭到清廷抗議。兩國並未宣戰，皆圖以外交手段解決，八月、明治政府任命大久保利通出任全權大臣，前往北京交涉。大久保拉攏英國駐北京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出面調停，清廷遂讓步於九月二十二日（西曆十月三十一日）簽下北京專約，承認日本出兵台灣是「保民義舉」，並給付難民撫恤金及日方修路建房費用共銀五十萬兩。大久保利通的此次

外交在日本獲得極高評價。春濤作此詩之時在大久保赴北京交涉成約後不久，⁸“排難有深謀”正是春濤對大久保此行北京折衝有功的讚賞之語。《詩鈔》卷十二《黃葉青山集》內有《大臣威武歌》一首及《都督凱旋歌》二首，與此詩作於同年而稍後，《大臣威武歌》稱頌大久保行使清廷折衝樽俎之功，《都督凱旋歌》則歌詠西鄉平蕃凱旋之戰績，內容皆可與此詩互證。⁹尾聯“壯心雖老吾何已”一句，化用曹操《龜雖壽》“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名句，表達作者雖自知暮年將至，壯心仍未能已，尚期待著能夠創出一番大事業來。蜻蜓洲系日本雅稱，所謂“決皆蜻蜓影外洲”，表明春濤對於海外戰事及外交折衝，也抱著極大的關心。這就與安政大獄之後詩人對於時政緘口不言，並寫下大量的遊仙詩的那一段時期，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政治態度。同時也可以看出春濤在政治上尊王攘夷的傾向。不過，儘管春濤自勉老驥伏櫪，有千里之志。放棄在名古屋與岐阜既有的安定生活，舉家搬遷至陌生遙遠的東京，詩人在期待之外也頗有些感慨與不安，這從他臨行前一日所作的《甲戌十月十五日將發岐阜留題》一詩中分明可以感受得出來。

飄零自歎老生涯，行色借秋拖晚霞。
學士後游辭赤壁，仙人前躅別金華。
破衫圓笠還為客，黃葉青山到處家。
偷舉離殤和暗淚，泫然彈向故籬花。¹⁰

開篇即感歎自己暮年飄零，頗有些自嗟自嘲的意味。至頷聯又寫自己戴笠披衫，客居四方，雖云“黃葉青山到處家”，實際也是詩人反語，屢次遷徙，實不知家在何處。尾聯“離殤”之語當是就亡妻國島氏而言，由思念已故親眷，引發出懷念故鄉、不忍別離之結句。其悽惶自傷，眷眷不捨之情，溢於文字之間。離別時詩人的情感雖然惆悵多於歡喜，不過，隨著離目的地東京的距離越來越近，詩人的興奮與期待也變得越來越強。春濤在上京途中經過富士山，並作七律《富嶽》一首。

扶桑一氣隘乾坤，突兀排空玉色溫。
齊魯之間無伯仲，泰嵩而下盡兒孫。
應為四海朝宗表，真有萬年天子尊。
定鼎維新誰不仰，波濤日夜欲東奔。¹¹

這首詩可謂氣勢恢宏，一掃春濤往日艷體優柔的風格。所謂“應為四海朝宗表，真有萬年天子尊”之語，以富嶽喻當今明治天皇實為四海朝宗、天子萬年的正統。而從尾聯可以看出，春濤對於明治維新的新政極力擁護，所謂波濤，即指富士山麓五湖的湖水，同時也是春濤自喻。詩人此刻的心境，恰如富士山腳下的波濤，日夜欲東奔而去。而詩人此行的目的地東京，即在東方。詩人以這樣的比喻，表現出其對於明治的新時代寄以厚望，並急於施展其文學抱負的迫切心情。

二.《東京才人絕句》與《新文詩》系列的編選

十月廿七日，春濤一行甫至東京，當夜永坂石埭即至春濤下榻處，為其謀劃居處。春濤遂作《念七日入東京，即夜石埭至，為予謀棲息地，喜賦》一詩，表達其寬慰欣喜之意。

洗塵何害酒先賒，夜雨寒鐙情可嘉。

憐我飄零來上國，就君商確借誰家。

一株牆角柴門柳，數點水邊籬落花。

久在山村嫌寂寞，幽栖要擇小繁華。¹²

石埭系春濤門下四天王之一，與春濤師徒關係親厚。石埭即夜冒夜雨前來為春濤接風洗塵、謀劃住處，春濤十分感念其情。值得注意的是尾聯兩句，所謂“久在山村”，大約是指春濤赴京以前在岐阜山野的半隱居生活。春濤實已厭倦了寂寞的山野生活，對於在東京住處的要求，“幽栖要擇小繁華”，即指幽靜中又不失繁華，此處的繁華，當指與當世的文人詩家能夠多所交流，不至詩名冷落、信息隔絕而言。而春濤與當世漢詩人們的交流，除卻日常的宴飲酬唱往來以外，最主要的，即是通過編輯漢詩文雜誌，甄選諸家詩作，定期結集出版的方式，逐步形成一個以春濤為中心的漢詩創作圈。

明治八年春，春濤赴京後不久，即編選刊刻了《東京才人絕句》二卷二冊，收明治初年江湖台閣諸派詩家計一百六十六人共五百六十三首絕句。卷首請“明治三大文宗”之一的川田剛作序，由當時的書法名家日下部鳴鶴（翠雨山樵）執筆。此書卷末有春濤《贈清客葉松石次其春日雜興韻》四首。為示謙虛，春濤於卷首識語中云：“贅拙詩於卷末，愿附驥尾，非敢比才人也。”

明治十年二月，春濤又編錄出版了《舊雨詩鈔》二卷二冊。此書系春濤受舊雨社委託而編，收錄了以藤野海南為盟主的舊雨社各派文人計五十九家詩作。卷首有藤野海南序，由名

書家關雪江執筆。與之前各家選編的絕句集不同的是，《舊雨詩鈔》收詩並不僅限於七言絕句，而是五七言各體均收。值得一提的是，此書卷末收春濤《湖上雜詩，以荷花世界柳絲鄉為韻》絕句七首，皆纖巧旖旎的艷體之作。

不過，春濤並不僅只滿足於編選當世詩集，而是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漢詩文雜誌的創辦與編輯上去。自明治八年（1875）乙亥七月起，春濤開始著手創辦漢詩文雜誌《新文詩》第一集，於是年十一月出版。此後的六年間，至癸未十二月（明治十七年、西曆1884年1月），共編輯出版《新文詩》一百集。平均約每月出版一集。此外，自明治九年（1876）初出版《新文詩別集》第一號，至明治十七年（1884）十月二十九日，共出版《別集》二十八號。《別集》主要收《新文詩》未刊之作品，或一期設一專題編選成詩集。《別集》停刊後，春濤又於明治乙酉（明治十八年、1885）五月編次《新新文詩》，由其子槐南參訂。至丙戌（明治十九年、1886）十月，共出版《新新文詩》十七集。另有單冊《新新文詩》一集，未刊出版年月，收有“詩膳（茉莉園未定稿）”及“詩餘（茉莉園雜著）”若干篇。自《新文詩》的創刊至《新新文詩》的停刊，前後歷時十一年有餘。可以說編輯出版《新文詩》系列雜誌成為春濤上京以後最主要的文學活動。在春濤父子十數年如一日的黽勉堅持與苦心經營下，《新文詩》系列可謂明治初期刊行最久、規模與影響亦最大的漢詩文雜誌。

《新文詩》系列的內容與編選動機

一.《新文詩》的命名

關於《新文詩》的命名，並非春濤隨意為之，而是蘊含有深意的。《新文詩》第二集卷末，有朗廬醉史所作《贈春濤老人》一文。原文不長，茲引於下：

頃日閱高選《新文詩》，不特文詩之新可喜。命名新奇，何其著意之敏也。蓋曰么麼冊子，特假音便，以當吾家吟壇新聞紙。抑人事、興雅趣，則兩存不可微焉。新聞紙示勸誡於新話，而新文詩放風致乎新韻，皆新世鼓吹之尤者。而詞林風月之光，則新文詩專任之。邦土古矣，而事則日新；人物舊矣，而思則日新。毛詩有之，“方叔元老，克壯其猶。”素亦云：春濤老將，克新其思。素頓首。¹³

朗廬醉史即阪谷素（1822-1881），備中國川上郡（今岡山縣井原市）人。阪谷系幕末明初時期的漢學者。明治三年（1871）年入京，供職於陸軍省，其後歷任文部省與內務省官

僚。並與福澤渝吉等加入名六社，系社內唯一的儒學者。明治十二年（1879）當選為東京學士會院議員。可謂典型的台閣派文人。春濤在此一時期與其有所交遊，阪谷在此文中指出了《新文詩》的命名系由諧“新聞紙”之音而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因循文明開化之潮流，創辦了多家新聞紙。先以小冊子形態刊行，如《中外新聞》、《江湖新聞》（1868年創刊）等，明治三年（1871年）日本最早的日報《橫濱每日新聞》創刊。翌年又陸續有《東京日日新聞》（即後來的《每日新聞》）、《郵便報知新聞》等創刊。其後，明治七年（1874）《讀賣新聞》創刊。明治政府認為新聞普及有利於開啟民智，遂積極支持並保護新聞產業。於日本各地設立免費的新聞縱覽所以以及為大眾講解新聞的新聞解話會，並制定以公費購買新聞紙等各項措施來支持各新聞社發展。在新聞紙大為流行的明治初期，春濤獨立創辦漢詩文雜誌，並特意取與“新聞紙”同音的“新文詩”來命名雜誌，無疑是期望它能夠像新聞紙風行全日本一樣，成為漢詩文界最通俗、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刊物。另一方面，《新文詩》的命名著眼於一個“新”字，誠如阪谷所言，以“新韻”記“新事”與“新思”，正是春濤編輯漢詩文雜誌的用意所在。而“放風致乎新韻”的編輯理念，也正合乎明治新世在文學審美上的新潮流。

雜誌既命名為“新文詩”，內容上自然是詩文並收。事實上，除詩文外，亦偶有詞、曲收錄。不過總體上《新文詩》所收作品仍以漢詩為主，各體皆有，而以七言絕句及律詩為多。這也是當時漢詩人之間最常用的詩歌體裁。

二．從春濤詩看《新文詩》系列的內容

(1).交遊酬唱詩

《新文詩》所刊登的漢詩，大約分為三類。一為交遊酬唱之作；二為詠時事或詠史之作；三為艷體詩作。春濤本人於《新文詩》上所刊登的作品，也不外乎上述三類。嚴格說來，春濤詩刊於《新文詩》者數量並不多，但常常以壓卷的形式出現。在春濤的主持下，茉莉吟社成員定期集會賦詩，並延請明治政府高官入社，與之宴飲酬唱，往來頻繁。這就誕生了大量的題贈唱和之作。《新文詩》的作者群中，既有台閣派詩人，亦不乏布衣詩人即所謂江湖派。春濤刻意與台閣派詩人結交，不外乎出於擴大《新文詩》影響力的目的。而事實上台閣派詩人的加入，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壯大了《新文詩》與其創辦者森春濤的名聲。雖然結交權貴使得春濤不免為人詬病，但在客觀上實則為明治時期漢詩創作的發展與興盛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新文詩》第一集有一六居士（巖谷修）所作《贈森希黃》一首，云：

筆硯提攜入帝州，小天台麓寄優游。

江山有助能如此，風月之權儘自由。

平日所交多顯達，高人於世豈營求。

我將遺贈樊川句，千首詩輕萬戶侯。¹⁴

春濤舉家入京後不久，於明治八年春入居於下谷仲御徒町三丁目三十二番地。因仲御徒町毗鄰供奉摩利支天的德大寺，因此又稱摩利支天橫町。春濤並將居所雅稱為“茉莉巷凹處”。德大寺隸屬日蓮宗，因而巖谷將春濤居處稱作“小天台麓”。詩中頷頸二聯透露出春濤這一時期社會及文學活動的一些內容。頷聯謂春濤得益於明治新世，在文學上終於能得以自由施展。而頸聯所謂“平日所交多顯達”，則指春濤平素多與達官貴人結交往來。小野湖山為此詩作註云：“二聯皆妙，妙在切於其人。”，丹羽花南則註曰：“宜做髯史小傳讀。”可知巖谷所言不虛。事實上，巖谷本人便是明治政府高官，歷任內閣大書記官、元老院議員、貴族院議員，是典型的台閣派文人。他所謂的“顯達”，實則也包括自己在內。至於“高人於世豈營求”一句，以及尾聯將春濤比作重情誼而輕功名的才子杜牧，當然都是巖谷的溢美之辭。不過，這也從側面反映出一個事實：春濤雖然與台閣派多有交遊，卻並不以出仕為目的。儘管春濤的學生如丹羽花南、神波即山，兒子槐南日後皆曾出仕，但春濤終其一生，並未踏入過政壇，也從未擔任過任何官職。遷居東京以後，春濤始終以江湖派詩人的身份經營詩社、創辦雜誌。明治十一年八月由中島一男編錄、春濤出版的《清廿四家詩》卷末版權頁上，春濤特意於自己姓名之前註明“東京府平民”，可以理解為對自己布衣身份的強調。借助於茉莉吟社的詩文集會，台閣派與江湖派詩人之間有了較為頻繁和密切的交流。當然這些交流僅限於詩文題贈與唱和，也即文學交流的層面。而《新文詩》恰恰是記錄兩派詩人之間此種交集的載體。

春濤及其門人所唱和交遊的對象，如川田剛、巖谷修、長松幹、阪谷素等人，皆系藩儒出身，明治以後均於中央政府擔任要職，且大都是貴族院議員或東京學士會院議員，地位顯赫。而小野湖山、大沼枕山等人，也是成名已久的詩家。從《新文詩》所刊載的詩文可以看出，春濤始終與他們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在漢詩創作上為其所認可、稱賞。而這些詩人題贈、唱和春濤的許多作品，都被春濤編入《新文詩》之中。

除上引朗廬醉史《贈春濤老人》一文及一六居士《贈森希黃》詩以外，如鷺津毅堂所作《森浩甫移住台南摩利支天街，賦此以贈》一詩，有“城中早已傳佳句，皆恨才人相遇遲”

¹⁵之語。以“才人”稱春濤，以其詩作為“佳句”，不啻為對春濤漢詩人身份的認可與稱許。岩崎秋溟《贈森髯史》詩頷聯云：“大雅遺音無繼手，清時至味付名流。”“大雅遺音”、“清時至味”云云，則是對春濤詩風的稱賞之語。此詩尾聯又云：“今日諸公有王事，此間樂地任君收。”¹⁶即點明春濤所交“名流”、“諸公”皆是輔佐王事的朝廷大臣，有這些人的襄助，則長安居易，可任由春濤施展其才華。第四集所收大沼枕山《東京才人絕句刻成，賦此以賀》一詩則有“春翁今日傳詩手，能把鸞膠續鳳絃”¹⁷之語。按“鸞膠”、“鳳絃”典出《海內十洲記》，謂西海中有鳳麟洲，多仙家，煮鳳喙麟角合煎作膏，能續弓弩已斷之絃，名續絃膠，亦稱“鸞膠”。後世詩人多用來比喻續娶後妻。枕山此處語翻新意，謂春濤刻成《東京才人之句》，猶如鳳絃再續，乃文壇之盛事。詩後春濤註曰：“續絃膠不敢當。受不辭者，以知己之言耳。”既可見二人關係之親厚，也可知春濤對於《東京才人絕句》編成付梓，頗有幾分自許之意。

此外，春濤及茉莉社詩人與當時清廷駐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公度）及隨員沈文燮（梅史）等人亦有詩文往來。《春濤詩鈔》卷十三《茉莉凹巷集》（自丙子至戊寅）有《清國欽差大臣何公突如來如，驚喜曷勝，賦二絕句以謝》二首。可知何如璋曾親自造訪春濤居所。何氏系首任駐日公使，自光緒三年（明治十年、1877）出使日本，前後四年有餘。隨行黃遵憲與春濤更是交遊甚篤，春濤子槐南以十七歲稚齡作《補春天傳奇》，春濤延請黃遵憲為其推敲文字並作序，黃氏欣然應允，並數次致書於春濤。春濤於《新文詩》五十五集、五十七集、六十二集分別刊出黃氏致自己的三篇書牘。其中五十七集所刊書牘稱槐南的《補春天傳奇》“一字一句，皆有黃絹幼婦之妙。愈讀愈不忍釋手矣。”並進一步稱讚春濤父子“父為詩人，子為詞客。鶴鳴子和，可勝健羨。”春濤刊登此文，當有為槐南彰顯才名的用意在內。

明治十五年（1882），何如璋、張斯桂任滿歸國，黃遵憲調任美國舊金山總領事。春濤及茉莉社詩人紛紛作詩送別。《新文詩》別集十六號即是雙方臨別互贈之作的彙集。其中春濤於卷末刊登其《送黃公度轉任桑港領事赴米利堅絕句二首》，有“煙花二月送君行，青柳影籠黃鳥聲”之語，可知春濤曾親自送行。足證二人交情之深厚。

除清廷外交使節以外，春濤一派詩人與清朝旅日文人王治本（號黍園）、王藩清（號琴仙）兄弟、葉焯（字松石）等人亦有詩文唱和往來。王氏兄弟與葉焯皆系浙東出身¹⁸，善詩文，王氏兄弟並工書畫。不過，與何如璋、黃遵憲等人不同的是，王氏兄弟與葉焯既無功名也無官職，在中國亦非已成名的詩家。其中葉焯旅日更是迫於生計，來日後在東京開成學校擔任漢語教師。春濤等人與他們交往，完全處於文學交流的目的，並無任何功利色彩。春濤

歿後，其子槐南將其遺稿《三國港竹枝詞》整理出版，即由王治本作跋文。從《新文詩》及《春濤詩鈔》的作品來看，春濤與葉焯私交甚厚，《新文詩》中保存了不少兩人互相題贈的作品。葉焯對於春濤其人評價亦很高。如第四集卷末刊有其《贈春濤詩壇》一首：

未曾謀面早心傾，辱荷簫韶和岳鳴。
一代才人編絕句，四方選政賴先生。
祇談風月場中樂，每有文章海外驚。
魏野林逋千古仰，奚須爵位始傳名。¹⁹

這首詩既提到春濤的文學事蹟，即編選刊行《東京才人絕句》，也提到他與政府要員多有交遊往來，所謂“四方選政賴先生”當然是一種誇張之詞，不過可以看出春濤與台閩派詩人之間維持著良好密切的關係。然而春濤與他們的交遊也僅限於“祇談風月場中樂”，並非於功名仕途上有所希求。因此尾聯以隱士林和靖比喻春濤，稱讚其不需藉助於功名爵位以成就詩名。雖然不免恭維之詞，但“奚須爵位始傳名”一語應當切合了春濤不以功名仕途為人生追求的心理。這大約也是春濤將他視為知己的原因之一。

承前所述，森春濤之所以結交仕宦名流，並非出於政治功利上的考量，而是希望借由這些人的地位與聲望，迅速提升茉莉吟社及《新文詩》的知名度，並擴大其影響力。春濤的詩文中，也完全見不到江湖派詩人之間常見的對於台閩詩人的排斥或批評。與台閩派詩人之間密切而友好的關係，不僅使得春濤可以在東京成功立足，其詩名得以廣播，聲望亦與日俱增。春濤能夠從地方上的漢詩人一躍而成為日本漢詩壇的盟主，與他的這種努力經營是大有關係的。

(2).詠時事詩及詠史詩

與顯達名流間的集會往來，使得春濤一派的詩人們能夠更為清楚詳盡的了解時局及時事。春濤雖然並無興趣直接參與政治，但對於時局新聞，仍然抱持著相當關心的態度。如前所述，《新文詩》的命名是有以詩文紀時事也即新聞的含意在內的。因而《新文詩》系列中詠時事與詠史的作品佔到相當的篇幅，是《新文詩》所收作品的又一大主題。例如明治十三年（1880）初出版的《新文詩》別集第九號，題作《上野博覽會雜詠》，所收作品均以題詠上野博覽會為主題。受歐美近代文明影響，日本自幕末時期即開始參加國際博覽會，如慶應三年（1867）幕府及薩摩、佐賀、水戶等藩藩士赴巴黎參加第二屆萬國博覽會。明治六年（1873

明治新政府首次正式參加了於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舉辦的第五屆萬國博覽會，並興建日本館，代表近代日本文明新成果的展示品獲得廣泛好評。而在日本國內，明治四年（1871）十月於京都西本願寺召開的京都博覽會可謂國內最早的博覽會。明治十年（1877）八月至十一月，東京上野公園舉辦了第一回內國勸業博覽會。這次博覽會歷時三個月，明治天皇與皇后皆出席了開幕式，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博覽會。《上野博覽會雜詠》即是茉莉社詩人們吟詠這次博覽會的專題詩集。可見春濤一派的詩人們並不侷限於集會唱和的小圈子，對於近代日本的科技與文明，也抱持著相當關心的態度。

除去吟詠紀錄博覽會盛況這樣的社會時事之外，對於內政外交方面的時事，《新文詩》中的作品也有所表現。例如《新文詩》第九集有毅軒居士（松岡時敏）所作《觀朝鮮修信使入京，同森希黃》及春濤所作《同毅翁觀韓使》各一首，紀錄朝鮮修信使訪日一事。

明治八年（1875）年九月，日本軍艦於朝鮮江華島附近與朝鮮守軍發生炮戰，是謂“江華島事件”（朝方稱“雲揚號事件”）。次年二月，日本與朝鮮簽訂了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條規》（朝方稱《江華島條約》）。日方並要求朝方遣使訪日以了解日本國情。同年五月朝鮮派遣金綺秀為修信使出使東京，受到明治天皇的接見。《新文詩》第九集系明治九年七月出版。松岡時敏詩中有“如使早來花未謝，輕舟且醉墨川春”一聯。墨川即隅田川，系東京賞櫻聖地。松岡作此詩時春櫻已謝，合乎金綺秀此年入京的季節。則松岡與春濤兩詩所詠朝鮮修信使正是金綺秀。按松岡時敏號毅軒，幕末時為土佐藩儒。維新後入京，先於文部省供職，後任左院二等議官。明治八年四月元老院成立時，當選為第一屆元老院議官。朝鮮修信使入京，春濤可以前往觀禮，大約與松岡的身份有關。據金綺秀撰《日東記遊》卷一載，明治天皇於赤坂御苑接見朝鮮來使。金綺秀等人向天皇行朝鮮君臣大禮：“見倭皇于赤坂之宮，儀節一如拜見我主上之禮。”金綺秀並對此作出解釋：“彼雖蠻夷之域，而戎狄之族，其國則固適體於我也，我又豈可以區區衣冠，妄自尊大也，妄自尊大亦非禮也，彼其情，豈或甘心而為之下也，余故以春秋列國交聘君臣相見之禮，仿以行之。”稱日本為蠻夷之域、戎狄之族，當然是朝鮮士大夫小中華思想的表現。而以春秋列國交聘往來比喻朝使此行，則顯現出積貧積弱的朝鮮面對強鄰日本時不得不作出妥協的尷尬與無奈。松岡與春濤的這兩首詠韓使詩雖然並未涉及如此複雜的政治背景，但所吟詠的內容仍然有深層含意可以解讀。如春濤《同毅翁觀韓使》一詩：

咫尺天涯喜可知，西來韓使入朝時。

衣冠或用明遺制，禮樂仍存漢舊儀。

紫陌晨光雲靄靄，丹墀日色午灑灑。

上林御賜新廚酒，既醉應歌洞酌詩。

前兩聯描寫修信使入朝的場面，頷聯“明遺制”、“漢舊儀”云云則可以看出春濤對於朝鮮保存明代舊服制與禮樂一事的態度。作為漢詩人，對傳統中華文化懷有仰慕之情並不難理解。也正因為如此，春濤詩中流露出對朝鮮來使一種文化上的親近感。後兩聯寫天皇接見時宴飲之歡樂。末句“洞酌”一詞典出《詩經》。《大雅·生民之什》有《洞酌》一篇，《毛詩序》解作：“《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春濤此處旨在歌頌明治天皇仁德敦厚，四海為之賓服。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既醉應歌洞酌詩”一語是對朝鮮使臣而言，在此之前曾屢次退回日本國書的朝鮮，此時迫於形勢不得不開國與日本簽訂合約，對於日本一方而言，無疑充滿了勝利者的喜悅。因此，要求朝鮮使節謳歌明治天皇的盛德，也即是要求朝鮮向天皇表示臣服之意。春濤在此詩中用到“洞酌”一典絕非偶然，這與他一貫以明治天皇為天下正統的尊王攘夷思想是深有關聯的。

詠時事詩以外，春濤另有不少詠史詩收錄於《新文詩》內。雖題曰詠史，卻往往借古諷今、鍼砭時事，有著很強烈的現實意義。《新文詩》十二集有春濤《詠史二首》，其二云：

末路一蹉隨覆轍，前功百戰不償身。

漢家當日恩非少，畢竟淮陰是叛臣。

根據《新文詩》十二集題下注，此集所收作品系明治九年丙子（1876）十月至十二月間所作。這一年十月末，熊本、福岡及山口三縣先後爆發神風連之亂、秋月之亂和萩之亂。這三次內亂的導火索是本年三月明治政府發佈的廢刀令。該令一出，引發舊肥後藩、秋月藩及長州藩士族強烈不滿，遂而向政府軍發起攻擊。由於亂軍勢寡，戰亂很快得以戡平。不過，發動戰亂的首領，如舊肥後藩的太田黑伴雄、舊秋月藩的宮崎車之助及舊長州藩的前原一誠等人在幕末皆屬於勤王派，積極擁護王政復古。如前原一誠自文久年間起致力於倒幕運動，明治三年（1870年）曾因戰功卓著獲賜“賞典祿”六百石，被列為“維新十傑”之一。由於對明治政府的一系列內政外交的決策不滿，加上廢刀令的施行褫奪了士族的特權，終於使得這些過去曾經擁護過明治天皇的武士們反戈相向。兵敗後太田黑、宮崎自盡而死，前原則被處以極刑。春濤在此詩中借詠漢淮陰侯韓信故事，發表其對時事的見解。在春濤看來，三次戰亂接連發生，可謂覆轍重蹈。而曾經為倒幕而戰的志士們如今倒戈相向政府，則前功已盡毀

。從春濤的措辭及用語可知他對於此次內亂持批判的態度。韓信曾有功於漢室，受劉邦恩遇亦甚厚，最終仍因牽連叛亂而論罪身死。春濤在最後發出“畢竟淮陰是叛臣”的感嘆，旨在責難前原等人無論過去如何有功於朝廷，其叛亂之舉辜負皇恩，終究不可饒恕。春濤的這種論調與台閣派詩人們是保持一致的。

明治十年（1877）二月，西南戰爭爆發，至九月底西鄉隆盛兵敗自盡，歷時近八個月。春濤及茉莉社的詩人們對此一事件均抱著極大的關心，《新文詩》第二十四至二十六集收錄了大量題詠這次戰役的作品。主題無非有二，一是祝賀官軍大捷，戰亂平定，如“妖氛忽斂瑞雲開”、“四海清平拭目看”云云；二是攻擊與批判西鄉，諸如“老賊”、“老姦”、“老狐”、“賊魁”、“凶魂”等語，措辭之激烈，正如諸家評語所云，“罵得痛快”、“罵得快甚”。其中春濤於第廿四集、廿六集刊登的八首絕句均為詠史詩。如廿四集所收《九月廿四日詠史》四首，其二云：

藪藏首級彼何心，孤壘雲荒暮氣沈。

輸與項王臨自刎，催呼故舊得千金。

明治十年九月二十四日，西鄉率領的薩軍退守鹿兒島，佔據城山。官軍以一萬餘人之勢對城山發動猛烈攻擊。西鄉中彈後命部將別府晉介斬下自己首級。其後部將將其首級掩埋，官軍未能找到。故而春濤開篇即發出“藪藏首級彼何心”的質問。並以此事與項羽兵敗自刎一事作對比。按《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同為兵敗自盡，項羽將自己的首級交與故舊領賞，西鄉陣營卻不肯將主帥首級交出。春濤借由這樣的對比，意在嘲諷與奚落西鄉叛軍。如果說，這首詩的遣詞還算客氣的話，第三首更是直斥西鄉“狗猶不食敗餘肉，焉得魂為天上星”。措辭之露骨，憎惡之強烈，真可謂“罵得痛快”。所謂“天上星”云云，當指本年九月火星接近地球，異常明亮，當時庶民之間盛傳火星中出現西鄉身影，時人呼作“西鄉星”。可見西鄉隆盛雖然戰敗身亡，仍然為百姓所敬仰悼念。不過，政治立場傾向於明治政府的春濤對西鄉成星的說法當然持否定態度。不惟如此，廿六集所收《九十月之交詠史》第三首中有“天家雨露有餘滋，地下兇畜悔可知”兩句。稱西鄉作“兇畜”，跡近謾罵之語。“地下悔可知”云云，正可與前面的“焉為天上星”一句相對看。木下彪氏在其《明治詩話》中稱春濤之所以盡力攻擊西鄉，“實以此迎合當政官僚之意，其所主辦的吟社吸收得勢官員，是為大

張門戶之策略。”²⁰前田愛氏在《幕末維新期的文學》一書中附和了木下的觀點。不過，前田在文中稱春濤為“官僚的走狗”²¹，評價則未免過苛。事實上，春濤對於西鄉並非一味地批判，例如《九十月之交詠史》其四以隋人李密比擬西鄉，開篇“讀書牛背已奇才，身敗家亡真可哀”兩句，可以看出詩人對奇才西鄉落得如此結局的歎惋惋惜之意。²²事實上，春濤評價西鄉乃至於其他政治人物，以是否遵循忠君守分的綱常大義為核心標準。在春濤眼裏，悖上作亂的西鄉已違背君臣之綱常，其亂臣賊子的罪名永遠難以洗刷。不過，對於西鄉的才幹與過去的功勳，春濤並沒有予以全部抹殺。

(3). 艷體詩

受春濤的影響，《新文詩》中艷體詩的數量亦很可觀。如第八集中鴛湖釣徒（葉焯）的《贈花南醉士，即倣其體》與花南醉士（丹羽花南）的《春雨小占》、十七集藍田仙史（股野琢）《首夏即興》、卅六集小泉散人（川島柔）《永晝》、四十九集槐南小史（森槐南）《青山》、五十八集三郊牧夫（杉山令吉）《春魂花影小照》、八十一集槐南小史《憐春詞》四首、九十一集石埭居士（永坂周）《梅影四律次韻》、別集第十集槐南小史《集桃花扇傳奇句》三首等等，不勝枚舉。可見，在春濤的帶領下，茉莉社詩人創作艷體詩已蔚為風尚。而春濤本人也在《新文詩》上發表了為數不少的艷體詩。如第六集《吉原避災詞》八首、《除夕德山純神波成二子來會艸堂，分韻成詠》²³、四十二集《善因緣歌》、六十六集《秋興二首》、八十一集《精廬德川公子穆如閣雅集，賦得春寒花較遲，以題為韻五首》、九十一集《梅影四律次韻》、九十五集《題嬌笑樓》、別集第一集《又得四絕句》、別集第五集《疊韻贈別四首》等等，春濤艷體詩的創作可謂貫穿《新文詩》系列的始終。試以《吉原避災詞》其二為例：

無端惘煞許飛瓊，酣宴不遑收玉筯。

報道崑岡俄有火，天風吹下步虛聲。²⁴

《吉原避災詞》八首之前，刊有用拙道人（松岡時敏）《十二月十二日吉原罹災，書此示希黃髯史》一首。吉原為江戶時期以來遊廊所在地，結合松岡詩中“被裏鴛鴦白晝眠，飛廉太妬祝融瞋”、“其奈揚州騎鶴客，可憐金谷墜樓人”等句來看，可知松岡在吉原遊樂時遭遇火災，事後將此次經歷吟詠成詩寄與春濤。春濤因而作《吉原避災詞》以為回贈。雖然題曰“避災”，春濤卻並沒有著力於描寫火場的恐怖或是逃生時的慌亂。他將妓女比作西王

母的侍女許飛瓊，將狎妓宴飲比作瑤池仙會，既是艷體詩的慣常寫法，也是為松岡狎妓的一種粉飾之詞。

第二首則以艷體寫火場逃生的場面：

五層樓子小陽臺，暮雨朝雲念念灰。

鴛夢一驚空一劫，步蓮徐脫火中來。

“陽臺”與“暮雨朝雲”典出宋玉《高唐賦》，前兩句春濤借楚襄王夢神女來會的故事，描寫妓女於夢中思念情人的寂寞心情。後兩句則寫鴛夢為大火所驚醒，女子於慌亂中逃生的場面。末句“步蓮徐脫火中來”用南朝齊東昏侯潘妃“步步生蓮華”的典故，比喻妓女逃生時裊娜的步態，造語十分綺艷別致。春濤並未親身經歷吉原火災，此詩內容當完全出於詩人想像。事實上，從松岡詩可知，當時的吉原火災中是有妓女因此而喪生的。春濤詩中對此也有所反映。如第七首有“玉質秋花劇可憐，綠珠金谷證前緣”之語。雖然以石崇寵妾綠珠比喻遇難妓女於事蹟上並不甚相稱²⁵，但此種香豔的筆法，確實是春濤詩的一大特色。無怪乎詩後雲沼（北川泰明）評曰“篇篇皆妙，真是森翁得意筆。湖翁所謂‘一種森髯艷體詩’者也。”以此八首為春濤艷體的典型之作。

北川泰明所引用的湖山詩系發表於《新文詩》第二集的《書春濤湖上雜詩後》一首：

千古香奩韓偓集，繼之次也竹枝詞。

兩家以外推妍妙，一種森髯艷體詩。²⁶

揖斐高先生論及此詩時，認為湖山末句以森髯稱呼中年以後蓄鬚的春濤，竟以偉丈夫之姿專寫豔冶佳麗的香奩體詩，實有揶揄之意。²⁷事實上，春濤於《新文詩》中所刊載的作品多題以“春濤髯史”名，髯史是他晚年常用的別號之一。從全詩內容來看，將春濤的艷體詩與香奩集、竹枝詞並舉，評以“妍妙”二字，可見對春濤艷體詩風的稱譽推賞之意。就《新文詩》中春濤與湖山之間的詩文互動來看，湖山對於春濤的艷體詩風並無些許批評之辭。《新文詩》十七集有湖山題贈春濤近作《小湖新柳詞》詩一首，題記曰“春濤髯史近作小湖新柳詞十餘首，艷音冶態，才華可掬。一唱之際，覺齒牙皆香。”“才華可掬”、“齒牙皆香”云云，顯然是對春濤豔詩的讚賞之詞，同時也可以看出湖山本人對於艷體詩其實抱著欣賞的態度。而湖山贈與春濤詩的這首絕句，事實上也系綺麗清新的艷體之作。則前一首“一種

森髯艷體詩”句解作揶揄，似乎並不確切，即便果真有揶揄之意，應當也只是同道中人間的善意揶揄，而非譏刺之語。

不過，雖然湖山等人對於春濤的艷體詩評價頗高，然而當時文壇對於春濤詩乃至《新文詩》作品的這種艷體傾向，其實不乏批判之聲。《新文詩》第二集卷末收有小永井岳（小永井岳）《書新文詩後》一文，對《新文詩》所收作品提出了尖銳的批評：“題號字面鄙猥，為優譚之語，甚不相稱也，又甚不相通。適為名士風流之累耳。所謂西施蒙不潔。吾輩寒陋村學，亦不得不掩鼻而却走也。”文後並附有小永井致春濤的書簡一則，曰：“貴著《新文詩》，一讀首首皆覺其清艷。但弟於《新文詩》字，不無小愚見。因書其後，大方以為何如。”這就可知小永井“鄙猥”、“優譚”等評語，是針對《新文詩》作品“清艷”的詩風而言。小永井的這種措辭當然招致茉莉社詩人的不滿，如靜窩在註中直斥其“自稱寒陋村學，其實堂堂道學先生。……蓋先生知世有孟子，而未知有讒謗律也。”不過，春濤對於小永井的批評並未作出過多反應。他將《書新文詩後》一文與前文所引阪谷素《贈春濤老人》一文並刊，並作識語云：

右二文同時得之，一褒一貶，禍伏福倚。嗚呼，毀譽亦糾繩哉！一笑併錄。

感歎“毀譽亦糾繩哉”，春濤固然是想藉此表現出自己不以為意的胸襟與氣度。不過，將毀譽與褒貶視為“禍伏福倚”，可知詩人並非完全不在意他人的批評。

《新文詩》第六集卷末有春濤七律《自詠》一首，頷尾兩聯云：“白髮烏絲餘舊影，花天月地寫新聞。編成毀至譽隨至，為是平生思不群。”再次提到了毀譽雙至的問題。春濤所提倡的艷體詩風，明顯有悖於溫柔敦厚的正統詩教，因而遭受非議與批評是不可避免的。春濤對此也應有所預料。不過，此詩最後詩人明確表示自己之所以吟詠風月、編輯詩文，以至於毀譽集於一身的根本原因，在於“為是平生思不群”七字。“思不群”語出杜甫《春日憶李白》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春濤對於自己平生所好的艷體詩風迥異於世俗傳統有著深刻的認知，他在此以詩思超然不群的李白自比，既是為自己不見容於世俗的艷體詩創作正名，同時也含有對自身異於凡俗的文學才能的肯定與自許之意。這大約正是春濤一直勉力經營《新文詩》系列雜誌、堅持艷體詩創作的根本原因。

春濤於艷體詩創作上所傾注的精力，並沒有隨著年紀增長而衰退，反倒是老而彌堅。這從他老後的詩文中可以看得出來。明治十三年（1880）三月春濤於六十二歲生日之前寫下《詩魔自詠》十二首，並將其刊登在《新文詩》第六十集卷末。詩前小引云：

點頭如來²⁸目予為詩魔，昔者王常宗以文妖目楊鐵崖。蓋以有竹枝緒匳等作也。予亦喜香匳竹枝者。他日得文妖詩魔竝稱，則一生情願了矣。

春濤對於友人所贈詩魔的稱號，欣然接受。不過，僅僅是詩魔的稱號還不足夠，需得詩魔文妖並稱，方可了卻一生情願。春濤這種不受傳統詩教束縛、大膽追求個人風格的文學自由精神在這裏可謂顯露無遺。《詩魔自詠》其中一甚而有“永劫不磨脂粉氣，詩魔賴得竝文妖”之語。堂而皇之地宣稱自己詩中的脂粉氣永遠不會消褪，顯示出詩人堅持創作艷體詩的決心，真可謂雖九死而不悔。依田百川在《送森希黃序》一文中說道：

君詩工於諸體，而最以豔麗者得名。……或疑其浮靡非正聲，余以為不然。詩者，性情也。關雎為國風之始，非以得性情之正乎。顧乃以庸腐為典雅，以枯澀為淡遠。模擬剽竊，以赫愚俗。言與情背，文與實遠。是非真詩也。不見夫《萬葉》、《古今》諸集乎，朋友贈答，男女酬和，性情存焉。若夫眾愚喧呶，譬如蚍蜉搖樹，未足為君病也。²⁹

依田在這裏不僅批判了“以庸腐為典雅，以枯澀為淡遠”的傳統詩教，更指出了詩的精髓在於性情。春濤艷體詩的可貴之處恰恰在於流露出作者的真性情，這就與“言與情背，文與實遠”的虛偽文風有著本質的區別。因此在依田看來，指摘春濤的人不過是蚍蜉搖樹，不能撼動春濤在漢詩壇的地位。依田所提出的性情一說切中了春濤艷體詩的本質，春濤將此文刊登於《新文詩》別集十四號上，並予以密密圈點，當有以此文為自己代辯之意。

在春濤的大力倡導下，茉莉吟社的詩人們尤其是春濤的門生弟子如永坂石埭、丹羽花南、森槐南等後輩詩人多有艷體詩作刊登於《新文詩》上。在明治維新、萬象更迭的新時代，比之溫柔敦厚的傳統漢詩，這種敢於表現性情的清艷詩風當然更容易為世俗所歡迎與喜愛。《新文詩》系列雜誌發行區域的逐步擴大與發行書肆的不斷增加，也間接地證明了這一點。

三．春濤文學活動的動機

有關《新文詩》系列雜誌的發行情況，目前已無法確知。不過，從發行書肆數量的變化上仍然可以窺見一些端倪。根據《新文詩》第二集卷末版權頁記載，編輯並出版人皆為森春濤，當時的發行書肆共六家，其中名古屋二家、岐阜一家、東京三家。東京發行商之一的額田正三郎亦是同年稍早出版的《東京才人絕句》的發行人。東京以外，名古屋與岐阜皆是春濤

久居之地，春濤詩名在當地已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與號召力。因此《新文詩》甫一出版，春濤首選名古屋與岐阜為東京以外的發行地。況且，《新文詩》於名古屋的發行書肆片野東四郎以及永樂屋正兵衛也是明治元年（1868）春濤於名古屋出版《銅椀龍吟》一書時七家發行書肆中的兩家。可知春濤選擇在名古屋發行《新文詩》，當有在發行人脈上的考量在內。明治十一年一月《新文詩》第二十九集出版時，發行書肆已擴大到十二地二十三家。除上述三地以外，又新增西京、大坂、高梁、德嶋、大垣、善光寺前、高山、甲府、佐原等發行地，遍及關東、東海、關西三大地區。同時，東京的發行書肆也已由之前的三家增加到八家。到明治十五年五月刊行第八十二集時，發行書肆更是增加到五十七家之多，其中僅東京就有三十二家，可見《新文詩》其時在都內的發行之廣及影響之大。此外，長野、新瀉等地亦開始有書肆販售《新文詩》。《新文詩》的發行點實已遍及本州各地。

另一方面，《新文詩》的作者群也在不斷擴大。《新文詩》第六集卷後刊有一至六集作家姓氏，共三十九人。其中有台閩名流如川田剛、巖谷修、阪谷素等，有春濤的同輩同門如關雪江、小野湖山、大沼枕山等，有春濤的弟子門生如丹羽花南、神波即山、永阪石埭等，這些人多數系《新文詩》的固定撰稿人。此後亦不斷有新進詩人作品刊登，並不定期於《新文詩》卷末增補作家名單。投稿者的增加，同時也意味著讀者群的擴大與影響力的提昇。加之發行區域與發行書肆的擴增，發行數量也必然隨之增加。《新文詩》的流行與茉莉吟社的壯大，無疑使得春濤在漢詩界的地位越來越穩固。而他之所以能成為明治初期漢詩壇的盟主，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新文詩》在漢詩文界巨大的影響力。

此外，迄今為止鮮有論者提及的是，春濤遷居東京下谷仲御徒町後，至遲已於明治十一年（1878）八月成立了茉莉巷賣詩店。³⁰茉莉巷賣詩店所發行的書目除春濤所編輯的《舊雨詩鈔》及《新文詩》系列以外，還包括小野湖山所著《湖山近稿》、《鄭繪餘意》、《蓮塘唱和集》及抄本《文章遊戲》、《文章綱領》、永阪石埭所著《橫濱竹枝》、三島中洲著《霞浦游藻》、鈴木蓼處著《大雲山房文鈔》、小山春山著《留丹稿》、河野秀野著《鐵兜遺稿》、小森橘堂著《橘堂詩鈔》、北川雲沼等人合集《六友詩存》及國島清子遺稿《古梅剩馥》等詩文集。春濤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漢詩文雜誌及漢詩文集的編輯、出版工作上，不僅促成了日本漢詩文壇的繁榮，也提攜了一批漢詩界的後進。不惟如此，春濤還儼然以明治漢詩界盟主的身份，將當世中國一些詩家的作品，介紹到了日本。如收錄張船山、郭頻伽、陳碧城三家詩的《清三家絕句》、李長榮的《海東唱酬集》以及陳碧城的《碧城仙館女弟子詩選》與《陳碧城香奩詩》等詩集，皆由春濤編錄並出版。此外，春濤也參與編選了《清廿四家詩》並予以發行。春濤主持出版的詩文集通常於卷末附有茉莉巷賣詩店發行書目，便於吸

引讀者購買。

日野俊彥於《森春濤的基礎研究》一書中，引用參與編輯《安政三十二家絕句》及《文久二十六家絕句》的家里松疇致春濤的書簡，考證當時的漢詩人於自己的作品被選編出版時，常常要贈與主編者禮金。這也是漢詩文集編輯出版者的重要收入之一。日野認為春濤日後編選出版多部詩集，也有出於經濟上的考量。此說當為可信。不過，成立茉莉巷賣詩店，出版並銷售漢詩文集，應當也是春濤晚年重要的經濟收入之一。從現有資料及本人作品來看，春濤晚年生活並不清貧，其謀生手段當不外乎上述兩項。可以說春濤晚年的文學活動也有出於謀生的目的。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春濤所編輯的《新文詩》系列為其子槐南提供了登上文壇並暫露頭角的機會。春濤長子真堂自幼從父學詩，少有詩才，曾被譽為學界麒麟兒。春濤將他視為繼承自己文學衣鉢的不二人選。安政七年（1860）三月真堂十四歲時不幸夭折，春濤大受打擊，作《哭兒真》二首以為哀悼。其中有“一飛雛鳳歸天上，哀矣人間老鳳聲”之語，³¹反用李義山題詠少年韓偓“雛鳳清於老鳳聲”³²的名句，表達失子的哀傷之情。文久三年（1863）十一月，春濤三子槐南出生，³³此時已四十五歲的春濤喜作《十二月十二日舉兒》詩二首，其中第一首有“昨來熊夢忽呈祥，雪有珠光月寶光”³⁴之語，可見對於幼子寄予厚望。槐南受春濤艷體詩風的影響，於《新文詩》系列雜誌上發表了大量的詩、文、詞、曲，也因此得到漢詩人橋本蓉塘、依田百川及清人王韜、黃遵憲等人的賞識與提攜。這與春濤的引薦和幫助是有直接關聯的。譬如春濤請黃遵憲為槐南《補春天傳奇》潤色文字並作序，並將黃氏關於此事的兩封回簡，以及茉莉社詩人橋本蓉塘所作《題補春天傳奇五首》與槐南《題小青圖》一文刊於《新文詩》上，皆有替槐南揚名的用意在內。而春濤與台閣派之間的交遊，客觀上也為槐南日後出仕奠定了人脈上的基礎。栽培槐南並盡力創造條件以使其能夠順利繼承自己漢詩文的衣鉢，恐怕也是春濤詩壇成名以後進行種種文學活動時的考量之一。

注

1, 《春濤詩鈔》卷七《牛背英雄集》內有《蓄髮呈拙堂翁》一首：“卅年圓頂傍風塵、喚作僧來不得嗔。

非有憐才韓吏部，誰知賈島是詩人。”揶揄自己行醫時代如僧人般需剃髮。按此詩作於丁巳年秋，即安政四年（1857）詩人三十九歲時。

2, 橫田天風《明治的清新詩派森春濤先生》（三），《東洋文化》第四十號，昭和二年八月，第83葉。

原文和文。

3, 《春濤詩鈔》卷八《夢入青山集》內收錄有《七十老翁何所求追悼星巖翁》三首、《哭兒真》二首、

- 《悼亡》四首；卷十一《桑三軒後集》內有《悼亡》二首、《夜涼聞笛》一首；同卷《敗柳殘荷集》內有《冬夜雜詩》十首等，皆悼亡憶舊之作，多感懷自傷之語。
- 4, 橫田天風《明治的清新詩派森春濤先生》(四),《東洋文化》第四十一號,昭和二年九月,第92葉。
原文和文。按此文第三部份(《東洋文化》第四十號)載春濤出發日期作十月十五日。
 - 5,《左傳·昭公十一年》:“僖子使助蘧氏之箎。”杜預註:“箎,副倅也;蘧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
 - 6,《春濤詩鈔》卷十一《太陽開曆集》、富士川英郎等編《詩集日本漢詩》、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7月、第19卷、第98頁。
 - 7, 出草是臺灣原住民獵人頭習俗的別稱。意從捕鹿而來。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卷五:“捕鹿,名曰出草。”朱仕玠《小琉球漫誌》卷八:“番以射獵為生,名曰出草。”清代蔣毓英《臺灣府志》:“好殺人取頭而去,漆頂骨,貯於家,多者稱雄;此則番之惡習也。”又清末李秉瑞等所著《蓬萊小語》:“時人入山,常遇靈怪悲號迴野,俗謂討路費,散冥鏹,可免。遇怪悲號猶可,遇番悲號,則以首級為路費矣。”當時琉球人漂流到台灣遭原住民殺害的事件屢見不鮮,通常由清廷依例救助及撫恤,琉球則於事後發諂文謝恩,其他責任一概不予追究。
 - 8,《登覽》一詩未紀年月,然其所在《太陽開曆集》創作期間系“自癸酉正月至甲戌十月”。此詩位於集末倒數第二首。且次一首題作《予將赴東京,次兒泰留別詩韻,題寓舍壁》。可知《登覽》作於甲戌十月,且在十月十六日啟程東京之前。另,春濤詩以干支紀年,以舊曆記日月。甲戌九月二十二日北京專約簽訂,則《登覽》一詩作於約成之後無疑。
 - 9,《大臣威武歌》:“大臣威武太從容,尊俎之間輒折衝。旗影紅搖東海日,天津水亦欲朝宗。”稱頌大久保行使北京的外交折衝之功。《都督凱旋歌》(題下註“甲戌十二月二十八日作”):“論彼冥頑語太溫,特令降虜感皇恩。功名不讓哥舒翰,平定生蕃勝吐蕃。”可知春濤對於西鄉從道強行出兵台灣“平蕃”之舉兵持稱讚態度。
 - 10,《春濤詩鈔》卷十二《黃葉青山集》、富士川英郎等編《詩集日本漢詩》、東京汲古書院、1989年7月、第19卷、第98頁。
 - 11, 出處同上,第98頁。
 - 12, 出處同上,第99葉。
 - 13,《新文詩》第二集、第十至十一葉。
 - 14,《新文詩》第一集、第二葉。
 - 15,《新文詩》第二集、第四葉。
 - 16,《新文詩》第三集、第五葉。
 - 17,《新文詩》第四集、第一葉。
 - 18, 王氏兄弟系慈溪黃山村(今屬浙江寧波)人。葉焯系嘉興人。
 - 19,《新文詩》第四集、第十葉。

- 20, 原文系日文, 中文系引者所譯。
- 21, 前田愛著《幕末・維新期の文学》, 東京筑摩書房, 1989年3月初版, 第208頁。
- 22, 按春濤對於李密其人應當持欣賞的態度。《春濤詩鈔》卷七命名作《牛背英雄集》, 即用李密典故。
此集所收詩為甲寅(1854)至戊午(1858)間, 即春濤三十六至四十歲時的作品。
- 23, 此詩不見於《春濤詩鈔》, 當系森川氏遺漏未收。
- 24, 《新文詩》第六集, 第二葉。
- 25, 《晉書》卷三十三〈石崇傳〉: “崇有妓曰綠珠, 美而豔, 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中略)崇竟不許。秀怒, 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 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 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 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 ‘我今為爾得罪。’ 綠珠泣曰: ‘當效死於官前。’ 因自投於樓下而死。”
- 26, 此詩亦收入《湖山近稿》卷二, 題作《題森春濤蓮塘詩後》。此詩末句作“一種森髯艷體詞”, 惟前句“竹枝詞”已用“詞”字, 未免重複。且“艷體詩”更合於實際情形。另此詩“偃”字作“澀”, 當為校勘疏失或誤刻。大約“詞”字亦類之。
- 27, 揖斐高《森春濤小論》, 收入入谷仙介、揖斐高校注《春濤詩鈔》(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明治編・漢詩文集), 岩波書店, 2004年3月, 441~442頁。
- 28, 關於點頭如來的身份, 入谷仙介與揖斐高二先生校注《春濤詩鈔》中云“當系春濤友人戲號, 未詳”。按《新文詩》五十八集有小野湖山《詩魔歌贈春濤髯史, 用清人梅某詩佛歌韻》七言歌行一篇。此詩作於明治十三年一月。則點頭如來當系春濤對湖山的戲稱。
- 29, 《新文詩》別集十四號, 第一至二葉。明治十五年五月出版。
- 30, 明治十一年八月由中島一男編錄、森春濤出版的《清廿四家詩》卷後附有《茉莉巷凹處發行書目》。而同年十一月由森春濤手抄、森泰二郎(槐南)出版的《清三家絕句》卷後附有《茉莉巷賣詩店發行書目》。內容覆蓋了《清廿四家詩》所附書目並有所增添。
- 31, 《哭兒真》其二, 收入《春濤詩鈔》卷八《夢入青山集》, 文會堂書店, 明治四十五年五月發行, 第三葉。
- 32, 李商隱《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 一座盡驚, 他日余方追吟“連宵侍坐裴回久之句”, 有老成之風。因成二絕寄酬, 兼呈畏之員外》其一。
- 33, 春濤與第二任妻子村瀨氏之間所生的次子晉之助日後被送與春濤異父姊村田家為養子。因而可以視槐南為春濤唯一的兒子。
- 34, 《十一月十六日舉兒》其一, 收入《春濤詩鈔》卷九《桑三軒後集》, 文會堂書店, 明治四十五年五月發行, 第四葉。